

“阿Q”的诞生

■ 张梦阳

100年前的冬天，《晨报副刊》主编孙伏园到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拜访鲁迅先生。他是鲁迅在绍兴时的学生，打算在他主编的《晨报副刊》办个“开心话”栏目，刊载与汇集一些可笑、幽默的文字，让人们在阅读报纸时获得轻松快意。他就是来向鲁迅先生约稿的。鲁迅答应了，写他酝酿很久的《阿Q正传》，当晚写出了第一章序。从1921年12月4日起，至1922年2月12日止，《阿Q正传》在北京《晨报副刊》分章连载，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。

这样，阿Q就诞生了。《阿Q正传》在《晨报副刊》登到第四章时，当时主编《小说月报》并兼记者的沈雁冰，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，就以大评论家的慧眼，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《阿Q正传》的伟大价值，在回答读者疑问时明确指出：

至于《晨报副刊》所登巴人先生的《阿Q正传》虽只登到第四章，但以在我看来，实是一部杰作。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，实未为至论。阿Q这人。要在现代社会中去实指出来，是办不到的；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，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，是呵，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！我读了这四章。忍不住想起俄国龚加洛夫的Obolomov了！

人们对事物的最初直感，往往会比以后由于种种压抑而被扭曲的认识包含更多的真实成分，何况是沈雁冰这样的文学天才呢！他这段对《阿Q正传》的最早评语，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后来百年间《阿Q正传》研究的主要方面，切中肯綮地道出了《阿Q正传》的真义！而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的联想，则启悟研究者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属于同一性质的艺术典型。“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”一语，正反映了这类艺术典型的普遍性特征。

《阿Q正传》发表后很快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如茅盾在《读〈呐喊〉》中所说：“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‘阿Q’这两个字。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。在接触灰色的人物时，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‘故事’的时候，《阿Q正传》里的片段的图画，便浮现在脑前了。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‘阿Q相’的人物，我们有时自己反省，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‘阿Q相’分子。”

1926年5、6月，敬奠渔首次把《阿Q正传》翻译成法文，发表在《欧罗巴》杂志第5期和第6期上。很快就被译成世界大文豪罗曼·罗兰的赞扬，说“阿Q的苦难永远地留在记忆中”。1925年6月，一位中文名字叫王希礼的前苏联人，拟把《阿Q正传》译成俄文，并请鲁迅写了序。1929年由列宁格勒激进出版社出版。《阿Q正传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传播到世界上并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品。

作家自己的陈述，是理解作品本意最可靠的根据。鲁迅在《俄文译本〈阿Q正传〉序》中自己陈述《阿Q正传》创作主旨时，说“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”，“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”。他“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，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，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。”

毫无疑问，这正是鲁迅创作《阿Q正传》的主旨和本意。

1927年11月10日，沈雁冰以方璧名义在《小说月报》第18卷第11期发表了《鲁迅论》。这篇论文是20世纪20年代鲁迅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，文中对阿Q典型性的研究也作了进一步的升华：“《呐喊》所能给你的，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——像一外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——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。说不定，你还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！在《彷徨》内亦复如此——虽然有几篇是例外。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，那最好是读一读《阿Q正传》。这篇内的冷静婉妙的讽刺，或者会使人忘记了——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，而认为只有‘滑稽’，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，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。你没有你的‘精神胜利的法宝’么？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Q么？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生过‘我的儿子会闹得多啦’的，阿Q式的自负？算了，不用多问了。总之，阿Q是‘乏’的中国人的结晶；阿Q虽然不会吃大菜，不会说洋话，也不知道欧罗巴，阿美利加，不知道……然而会吃大菜，说洋话……的‘乏’的‘老中国的新儿儿’，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Q罢了。不但现在如此，将来——我希望这将来不会太久——也还是如此。”

沈雁冰的这段论述是异常重要的。其良苦用心在于提醒人们不要以为《阿Q正传》只有“滑稽”，而忘记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——“精神上的胜利法”，忘记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“开出反省的道路”。这实质是阿Q典型性中的精义，离开这个精义，就不可能读懂《阿Q正传》，不可能从中获得教益，也不可能使阿Q典型研究沿着正确的途径向前进展。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，有删节。）

海南古书院：
弦诵声，洋洋四海间

■ 曾庆江



▲ 五公祠中胡铨塑像
▲ 琼台书院

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

自从宋朝庆历年间兴学开始，海南各州县出现官办儒学。除了官办教育外，各种各样的书院在海南古代教育史上也是功不可没，甚至可以说，各种层次的书院是海南获得“海滨邹鲁”这一美誉的重要构成。海南书院，或者是因为景仰先贤而倡建，或者是贤人为回馈家乡而创办，或者是地方名宦矢志教育而倡办，它们共同书写着海南古代教育传奇。

秉承先贤遗风倡建书院

在海南文化发展史上，不少贬官流臣为弘扬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王义方、苏轼、胡铨等人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。后来，海南人民秉承这些先贤遗风，倡建各种书院，一方面向先贤表达景仰之情，另一方面则继承其衣钵继续推动海南教育。

苏轼谪居儋州三年，极大推动当地教育发展。尤其是姜唐佐、符确等人得到苏轼的亲自指点，先后成为海南见之史载第一位举人和第一位进士，实现海南科举史上的“连破天荒”，从而传为佳话。后来人们在苏轼讲学的地方建起东坡书院。

载酒堂原本是儋州名贤黎子云的一处居所，因为苏轼的缘故，成为谈学论道的重要场所。后来，载酒堂成为人们缅怀苏轼功绩的重要场所，得到不断修缮。元朝时，当地政府将载酒堂改建为学宫。明朝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，载酒堂更名为东坡书院。琼州也曾建有东坡书院。

此后，琼州、儋州不少地方官都对东坡书院的运营、发展、扩建予以了相应的支持，从而使得东坡书院的影响越来越大。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儋州进士（也是海南最后一位进士）王云清主讲儋州东坡书院，栽培出不少优秀人才。清朝末年，因为学制改革，东坡书院改为农学。至今，修复一新的东坡书院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是海南著名的文化旅游名片。

绍兴年间，抗金名臣胡铨被贬吉阳军，在路过临高时受县令谢澥邀请，在茉莉轩向全县士子讲授《春秋》，从而推动当地教育发展。得到胡铨指点的戴定实后来成为临高历史上第一位举人。人们为了怀念胡铨对当地教育的推动，先后创办了茉莉轩书院、瀛庵书院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茉莉轩书院演变为当前的临高中学，依然是地方教育重地。

名贤感恩家乡创办书院

明清时期，海南教育得到较快发展，不少读书人通过努力考中进士，并在朝廷担任官职。比如丘潜在中进士后走向仕途，最终成为“明朝文臣之宗”，还开了有明一代以尚书身份进入内阁的先河。张岳崧考中探花功名，嘉庆皇帝连连感叹“何地无才”。这些饱学之士，带着感恩的心理，先后在家乡创办各种书院，为地方教育奉献自己的心力。

由贡生陈文徵倡建的桐墩书院是明代海南最早的书院之一。陈文徵在琼州城东得一高墩，土地肥沃，溪流环抱，风景优美，因此积土成山，种植桐树，以作制琴材料，并于

名宦矢志教育倡办书院

海南历史上有不少地方官员较有作为。他们大多为饱学之士，通过科举走上仕途，因此非常重视教育。这些官员除了重视州学、县学的建设和改造外，还投入相当的精力创办书院，甚至亲自主讲书院，为地方教育贡献了力量。

明朝成化年间，担任御史涂秉曾二度到海南巡视，大力推崇儒学教育，下令整顿和扩建府、州、县学，并兴建社学，并为琼州府学的扩建捐款，获得很高声誉，被海南百姓敬称为“涂公”。他还亲赴儋州专门为薛远建立“尚书坊”牌坊。成化九年（1473年），涂秉在琼州府治西侧

山麓筑室藏书，命名为“桐墩书舍”。后来影响越来越大，桐墩书舍更名为桐墩书院。丘潜曾作《桐墩记》予以赞美：“弦诵之声，将由是洋溢乎四海之间，而旁洽远邇耶。”

有“岭南人士之冠”并撰写正德《琼台志》的唐胄出生在琼州城东的攀丹村，他在弃官返回故里之后，创办养优书院，作为读书、教学之所，受到儋州百姓的推崇。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，儋州知州韩祐因为景仰许子伟，特地寻访义学旧址，并捐资重建，命名为“丽泽堂”。道光七

年（1827年），在许子伟创办的儋耳文学的基础上，丽泽书院得以创建，成为儋州地方教育的重要场所。位于文昌铺前的溪北书院是清末海南最有名的书院之一，是由海南名贤潘存于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倡建，并得到雷琼兵备道朱采和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。潘存是著名书法家，还曾向朝廷提议“琼州改建行省”，是倡导海南建省第一人。修建溪北书院后，潘存购藏了许多书籍，勉励年轻人勤勉读书，并亲自撰写学堂联。溪北书院至今还保存其手迹：“学问无他，求益乎身心家国家天下；载籍极博，折中于易诗礼春秋。”这是他对后人的期望，也是他终其一生的写照。溪北书院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焉，因此更名为“蔚文书院”。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蔚文书院再次扩修，规模更大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清朝进行学制改革，蔚文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，民国时期又变成县立中学。

享誉中外的琼台书院虽然不是海南历史最长的书院，但是见证了海南教育发展。清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，进士出身的焦映汉被任命为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。到任后，焦映汉先后赴各县巡视，还先后瞻仰奇甸书院（由丘潜创建）、东坡书院等，出于对苏轼、丘潜、海瑞等人的景仰，又深感海南教育的落后与衰败，决定筹建书院。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，建于琼州府城中心的书院落成，焦映

汉将其命名为“琼台书院”，其意义有三：其一，琼台系琼州别称，体现府立性质；其二，琼台系丘潜别号，有向先贤致敬之意；其三，与当时执掌全岛军政大权的道台、镇台合称为“琼府三台”，以示对教育的尊崇。嘉庆四十年（1809年），曾在琼台书院攻读的定安人张岳崧考中进士一甲第三名，即探花，将海南科举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后，琼台书院先后更名为琼州府中学堂、琼崖中学堂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更名为琼台师范学校，后又升格为琼台师专，现为琼台师范学院。在三百年发展史上，琼台书院为海南培养了大量人才，被誉为琼岛人才的摇篮。

创建书院，取“文教大同”之意，因“文同则治同”，最终实现“天下一家，华夷一统”，命名为“同文书院”。一时之间，同文书院吸引了很多海南子弟前来攻读。

最早建立于明朝万历年间的蔚文书院，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海南古代书院历史。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，文昌知县贺沚倡导，在乡绅曾应期、林有聘、林有鸣的捐助下，建立玉阳书院。玉阳书院实行开放式教学，广邀名贤前来讲学，如王弘海、许子伟等都曾在此讲学，从而获得极高的声誉。清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，广东学政姚文田视察学政，发现玉阳书院已经破败不堪，因此筹资予以补修扩建，从而使其面貌焕然一新，“识者咸卜人文蔚起

牧牛澄泥砚(明)

牧牛澄泥砚(明)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，长16厘米，宽9厘米，高5.8厘米。

砚作卧牛状，牛昂首，双眼圆睁，目视前方，牛角向后弯曲，四足相对，牛尾向前甩动。牛背作圆月，为砚池，一牧童俯于牛背上，身向前探。砚池峰黄有斑，砚周为墨色。泥质坚硬细润，有如石制。

此砚造型独特，生动可爱。线条圆滑，泥质细润，周身外表漆黑发亮，牛背为砚池，砚池橘红

色。牧牛澄泥砚是明代进贡朝廷的一个砚种，也是明代澄泥砚中不可多得的珍品。

砚为文房四宝之一，以笔蘸墨写字，笔、墨、砚三者密不可分。砚之起源甚早，大概在殷商初期，笔墨砚就已粗具雏形。刚开始时是以笔直接蘸石磨写字，后来因为不方便，无法写大字，人类便想到了可先在坚硬东西上研磨成汁，如石、玉、砖、铜、铁等……殷商时，青铜器已十分发达，且陶石随手可得，砚乃随着墨的使用而逐渐成

形，古时以石砚最普遍，直到经历多代考验仍以石质为最佳。

秦汉时期，陶砚、瓦砚、铜砚、漆砚等砚的历史由来已久，据《古今事物考》记载“自有书契，即有此砚。盖始于黄帝时也。一云子路作。”

直到两汉时期，汉代由于发明了人工制墨，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，故不需再借助磨杵或研石来研磨天然或半天然墨了。如此看来，磨杵或研石经过史前及夏、商、周共三千多年的漫长跋涉，才逐渐消隐。（杨道辑）



白居易与苏轼的鸣鹤之应

■ 黄柳

最近读唐诗宋词，发现一代文豪苏轼竟然是白居易的超级粉丝。据南宋罗大经说：“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，东坡尤甚。”

苏轼也叫苏东坡，“东坡”这个名号就与白居易有很深的渊源。白居易曾写诗遭诬陷，被降职为江州司马，又迁为忠州刺史。忠州城东有一山坡，白居易于公事之余，常到坡上植树种花。还在这里写下不少诗篇，如《东坡种花》“持钱买花树，城东坡上栽”，《东坡种树》“东坡春向暮，树木今何如”，还有《别东坡种树》“何处殷勤重回首，东坡桃李种新成”。白居易与“东坡”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后人亦将“东坡”作为白居易的代名词。

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，苏轼也曾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。在黄州期间，苏轼在城外东坡开垦荒地，种种菜蔬，消遣心情，并在那里盖了间“东坡雪堂”。苏轼当时的境遇、心情和所耕之地同当年白居易谪居忠州时颇相似。而且苏轼也经常在许多诗中表达对白居易的仰慕。如在《去杭州》诗中就说：“出外依稀似乐天，敢将衰朽较前贤”，“衰朽”是苏轼自喻，“前贤”则喻白居易。他还在此诗的“序”中说：“平生自觉出老粗似乐天。”于是出于对白居易的仰慕，苏轼在四十六岁时，给自己取了“东坡”这个雅号。

苏轼有一爱妾叫王朝云，“朝

云”一名是苏轼所取，源自宋玉《高唐赋》中“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”的巫山神女。在我看来这个名字似乎和白居易的一首情诗《花非花》里的“来如春梦几多时？去似朝云无觅处。”有着密切的关系。“白居易有歌女樊素相伴，苏轼有朝云解忧。苏轼给爱妾取名时应该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偶像做了一番比较吧。

苏东坡许多经典名句都取材于白居易的作品。读了白居易的“花非花，雾非雾”，写出了“似花还似非花，也无入惜从教坠”的名句；受到白居易《惜牡丹花》“明朝风起应吹尽，夜惜衰红把火看”的启发，吟出了《海棠》中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

高烛照红妆”这两句令人津津乐道的惜花诗；《定风波》里那句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也出自白居易的《初出城留别》中的“我生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”。

林语堂说，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。贬至条件困苦的岭南，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洒脱的诗句；与弟久别，他许下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美好祝愿；遭遇风雨他潇洒高歌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。其实苏轼的豁达乐观，淡定从容的心态也是受了白居易潜移默化的影响。白居易是名副其实“乐天居士”，他一首诗看透了人生“蜗牛角上争何事，石火

光中寄此身。随富随贫且欢喜，不开口笑是痴人。”人生在世，就好像被局促在蜗牛角那般狭小的空间之中，何必为了无谓的事情而争执呢？人生短暂，如电光火石转瞬即逝。所以说，人生不必汲汲于富贵，也无须戚戚于贫贱，且放宽心活得开心一点，不常开口笑的都是傻子！

苏轼欣赏白居易“闲适豁达”的人生观，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，探寻内心的自适平和，并将这种思考融入自己的作品中，从而在困境中能够保持乐观豁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，以达观超越的人生态度笑看人生。

文史荟

投稿邮箱 hnrbyfb@sina.com

投稿邮箱 hnrbyfb@sina.com